

从访谈节目《十三邀》看媒介精英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中的困境

彭惠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

摘要: 本文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的辩证分析入手, 肯定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学理上的区分。正是因为两者的区隔存在, 从而担当“承上启下”作用的媒介精英角色应运而生, 由此也形成了中间人的困境。“媒介精英”从传统媒体中“公共知识分子”发展而来, 本文通过以访谈节目《十三邀》中部分访谈人物为研究对象, 发现了当代媒介精英在面对大众文化时呈现的三种不同状态, 以及从传统公知采访人许知远角度看到的三种困境。本文肯定了困境的存在, 并分析了困境存在的原因以及当代精英主体应承担的责任。

关键词: 《十三邀》 媒介精英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 (字号:楷体小五黑体) **文献标识码:** (字号:楷体小五)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辨析自上世纪末以来学术界便讨论已久, 对两者的批判态度也在随时代调整走向中肯。随市场经济实行后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纷纷崛起, 出现一批在公共领域内发声与露面的知识精英式意见领袖, 他们被贴以“公共知识分子”、“电视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等标签, 在广受褒奖与“污名化”的争议中, 完成着与大众的互动。近年来随新媒体对话语权力的发放, 公共领域内话语主导者身份鱼龙混杂, 这些主导者身份虽不能以“知识分子”标签一以概之, 却作为意见领袖或精英主体影响着知识分子群体属性, 影响着大众话语风格, 也影响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方式。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关系的形成

探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首先需要辨清的是是否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

虽然两者从划分之始就已经具有一定的精英主义倾向, 但无论是从中国文化形态的嬗变, 还是西方的商业文明发展进程来看, 大众文化在其诞生之日, 其所带有的工业化后的商业复制属性便与精英文化有了区隔(尽管两者在后来有其交融之处)。这种文化形态的嬗变, 本文认为高丙中(1996)^[1]在以文化群体的变迁窥见中国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三者的关系时总结得最佳。他将这种群体或说文化的关系变化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以士大夫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完成的从士大夫文化到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转变; 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对全民文化的一体化改造; 第四阶段是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 使与士大夫精神一脉相承的知识分子即精英阶层地位衰微, 大众文化逐步压制精英文化。由此可见的是, 由于大众文化属于后来居上, 两者经历了从分流到走向并流的过程, 所以两者具有一定的概念区隔。

正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概念区隔, 所以在两者并流时, 引起了学界谨慎而广泛的讨论。从任婕(2007)^[2]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梳理可见, 中国学者对大众文化批判态度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从八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式激进批判, 到九十年代初期引入英美文化研究派、后现代文化研究派、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符号学派等思潮后的精英主义式贬

低，到九十年代中期后中国学者才开始结合本土语境，开始肯定大众文化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对大众文化的逐步接受或者说不得不接受，才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关系形成有了可能，才有了之后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等称谓形成。却也是因为精英文化的根深蒂固，与对后起之秀的大众文化的审慎态度，才有了对“公共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的争论，使其在之后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中形成困境。

所以本文认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学理上的分别，且较为认同的是肖鹰（2012）^[3]对两者进行的特性区分，即大众文化的目标重在“普及”，在于一种“惯性的消费享受的持续”，而精英文化的目标重在“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和文化创新”。也正是如此差异存在，才有“互动”与“困境”之说。

二、媒介精英的形成

“媒介精英”一词为文本对研究对象的概括总结。“媒介精英”是新媒体兴起后，担当意见领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水准参差不齐或者说下降、意见领袖的身份模糊、表达方式多元化所致。而这些意见领袖因其个人能力与社会资源所掌握的话语权，或因其话语权力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得不说已经具备了社会精英的含义。高丙中（1996）^[4]说道，“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本文一方面也是为统称方便，所以称目前具有大众话语领导权力，并利用大众媒介发声的某行业领先人物为“媒介精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随大众媒体的兴起，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沟通人经历了从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媒介精英的身份转变。

《十三邀》是一档由许知远作为发问者的访谈节目，目的是通过许知远与嘉宾对话形成“社会切片”。节目每季邀请十三个嘉宾，嘉宾涉及演艺界、文化界、商界等群体，目前两季已完结。由于嘉宾基本均为业界精英，曾经或正在公共领域发声，且大多为大众熟知，所以具备“媒介精英”属性。

嘉宾选取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是该节目对时代把握的精准之处，也是节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媒介精英值得关注，本文认为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媒介精英由于自身能力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所处的阶层位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结晶，其眼光与决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方向，大众会跟随精英的眼界，拓宽对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其二，由于大众主动或被动接受媒介精英的价值观输出，所以媒介精英的话语风格与态度具有大众的共性。这是所选取的嘉宾具有“社会切片”功能的原因，也是媒介精英对于观察时代社会的重要性所在。

三、《十三邀》中媒介精英困境的形成

节目中所呈现出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许知远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与已熟知当代大众话语体系的媒介精英的对峙。许知远作为当代典型而难得的精英主义恪守者，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依旧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批判者，带着其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面对采访嘉宾时，发问主题大致指向以下三个方面：一、精英的理想主义与

崇高性衰落的原因；二、时代文化走向肤浅的原因；三、知识分子在其中应承担的责任。对此发问，各嘉宾的典型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白先勇、蔡澜、张楚为代表的所选取的避世态度；一类是以李安、克里斯托弗诺兰，以及包括金承志为代表的选择游刃于商业与艺术之间的中立保守态度；一类是以罗振宇、马东为代表的完全拥抱商业和大众文化的开放态度。而许知远均因这些媒介精英没有选择“反抗”，对以上三种态度都表示怀疑与批判。

许知远的势单力薄是精英文化受大众文化侵蚀而无力反抗的表现，他的法兰克福式发问是九十年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系辨析的再现，结合当下商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同步驱动下的多元文化语境，对于精英主体的关注再次显现其意义。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根据节目中许知远与嘉宾对话，精英主体面对大众文化所表现的困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英主体面临市场竞争，不得不贴合大众口味。精英主体的媚俗自“电视知识分子”出现以来便已受到学界广泛批判形成主体困境之一。如果早期报纸评论中，各公共知识分子还能隐藏自己身份单凭文字真功夫和读者见面，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在电视、网络兴起之后，各行业精英被推向舞台，聚光灯下的他们变得需要像明星一样表现，知识分子们面对的不一定是如报纸杂志一样主动选择购买他们传播信息的观者，或者主动去到他们课堂或演讲场的听众，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被动选择的受众，他们必须要在第一次见面时在最短时间内吸引到那些只是闻讯而来，或者只是恰巧无聊打发时间路过的观众，媒介精英与他们传播的信息被加上标签变成商品传播，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争夺着观众的注意力。知识变成商品，严肃面临解构，用许知远的词来形容这是“庸众的胜利”。该点在节目中尤其体现在作为商人的罗振宇与马东身上，他们肯定娱乐是人的先天本能，淡视理想主义情结，努力表现出积极拥抱并开拓着大众文化市场的一面。

第二，精英文化话语空间狭小，精英文化无法输出导致失语。其中精英文化话语空间狭小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节目前后，大众对许知远贴上的“猥琐”、“丑陋”、“油腻”等标签，忽视其关注的人文主义讨论，直指场面的尴尬、让嘉宾难堪，却少用严肃主义态度反省节目或刻意突显矛盾的原因。而正是因为大众的注意力发生转向，导致精英文化难以输出，部分精英主体则干脆选择逃避，加深了精英文化的失语现象。车美萍（2010）^[5]在描述精英主体困境的表现时，将困境分为精英意识的缺失、精英行动的迟钝、精英地位的边缘化三个方面。其中关于精英主体意识的缺失可以用来解释产生失语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精英主体因经济地位下降失去了民众长久以来仰视的目光时自卑感会油然而生，一方面受到了来自其他精英主体对精英意识的批判，认为精英意识是知识分子自视过高的表现，容易导致乌托邦和文化专制主义，而这些质疑均易对精英主体的发声产生威胁。

第三，精英主体自身的俗雅二重性矛盾。这一矛盾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本身可互为源头相互交织。李德顺（2008）^[6]提到了一些有关高雅文化刻板印象，“例如在某些潜意识中，一味地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以静为雅、以动为俗；以庄为雅，以谐为俗；以虚为雅、以实为俗，等等。”由此可见雅俗难辨，也说明雅俗之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具有互变的可能，大众文化经过历史与时间的检验就有变为经典的可能，市场经济具有自我洗涤的功效。而在等待时间检验的过程之中，雅俗

的二重性便可在同一主体的作品中呈现。这种二重性在熟谙大众话语体系的年轻精英群体中体现尤为明显，在《十三邀》中则体现在彩虹合唱团指挥金承志身上。合唱本属传统印象中的高雅艺术之一，在金承志的作品中却开创式地以戏谑写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但同时又以幽深描绘中国传统山水意境，他因前者受大众追捧，却恪守着后者的艺术创作风格，努力借前者的力将后者向外推广。于是许知远试图将金承志单纯向往高雅的一面挖掘出来，不料这种雅俗并行的价值模式确实存在，与许的纯精英式反抗精神并不相同。

四、 困境反思

其实以上梳理可以发现，所谓媒介精英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中的困境对于部分媒介精英自己来说并不是困境，他们面对大众文化时所表现的避世、中立、开放性的态度，也许只是其选择的处世方式，并不构成穿行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中的困境感的出现依旧只是属于诸如许知远这一类知识分子。但正是因为我国的当代文化正走在走向多元，并在努力寻找符合当代语境的榜样文化的进程之中，所以在多种态度之间，本文认为需要为许知远站边，需要支撑势力相对弱小的严肃文化，形成对多元文化的大众化偏向的反面拉力，才可使两者平衡发展，形成真正的榜样文化。于是对以上困境形成的原因反思如下。

后工业时代里的信息洪流是意见领袖身份得以突显的主要原因，在教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情况下，知识的“全”与“精”便形成矛盾。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使大部分人的知识体系“精”而不求“全”，以谋生为目的的专业化知识学习使知识成为工具，接受信息行为变得功利化。人类对信息的渴求本身多元，谋生现实却压榨了培养广泛兴趣的时间与精力，使人在接受更多信息时只能表现为肤浅化，除非信息以功用，否则只为娱乐消遣罢了。在此背景下，部分兼具功用与娱乐的媒介精英应运而生，他们以全面且层次高于一般受众的知识水准占领着话语鳌头，不太注重或无力注重知识思辨力的受众便会选择全盘吸入。尤其国内的学校教育中，缺乏独立批判态度的培养，缺乏常识的启蒙，便使得态度鲜明、见识广泛的媒介精英成为时代“英雄”。

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动中，能够欣喜地看到了两者交融的趋势，主题严肃的大众传播节目如《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等同样受到市场欢迎，观众对纪录片的价值肯定越来越高。随大众审美的提高，一些只是单纯追求感官刺激，吸引眼球的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谴责，这些都是文化生态在转向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所以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大众的需求是多样的，也需要清醒地坚守着传承优秀文化的操守。尽管在多元文化形态里，精英主体依旧处于缘边化地位，但却依旧是引领社会向上发展的中坚力量。

《十三邀》在采访二次元群体的结尾写道，“你可以不理解动漫，可以对宅人嗤之以鼻，但是不要忘记在看似肤浅又离经叛道的外表下，隐藏着梦想的虚空，社会的畸形与悲哀，以及每一个心灵深处的自由与梦想。”托马斯·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管他们处境如何，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皆会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因此，知识的本性是永远指向新的(未来)，而知识分子也就必然以寻求未知事物甚至不可

能存在之物作为自己的思想徽章。为什么精英只是少数的是因为，精英是为观察世界全局，引领社会发展而生，但大多数人为自己现世考虑就已足够。这不仅仅是在于物质条件的丰盈与否，更何况财富不均等将永远存在。而是追逐整体精英本身只存在于过程，实现全体走向精英是一个悖论。因为当所有人都成为精英，那么精英还需为整个世界思考什么，以独立于时代、永怀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还需批判什么呢？就像假如全天下病人都身体健康，那医生还会存在吗？所以谈论精英主体的责任，回溯精英主义的价值在每个时代都具有意义。正如卢健（2003）^[8]所言“‘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本体性否定眼里’，也就是中国知识和价值体系的自我再生产问题。或者说是建立一个不同于古代文明、也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既有的知识结构回答不了的，从而也是我们可以施展自己可能性的地方。”而“中国知识和价值体系的自我再生产”即“建立中国当代的新型文明”的问题，也是当代精英所应承担的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 [1]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1996(02):108-113.
- [2]任婕.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的研究报告[D].华中师范大学,2007.
- [3]肖鹰.中国文化的问题在精英文化取向的下滑——兼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J].探索与争鸣,2012(05):5-7.
- [4]同[1]
- [5]车美萍.困境与拯救:中国精英文化三十年[J].山东社会科学,2010(04):28-32.
- [6]李德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辨[N].北京日报,2008-01-28(017).
- [7]孙叶飞.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提升[J].前沿,2006(01):182-184.
- [8]卢健.中国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批评[D].南京师范大学,2003.

Title

From the interview program "Thirteen Invitations" to the plight of media elit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PENG HUI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and affirms the theore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that the role of the media elite who plays the role of "connect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above and the next" came into being, which also formed the

dilemma of the middleman. "Media elites" developed from the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traditional media. This article uses some interviewees in the interview show "Thirteen Invita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scovers three types of contemporary media elites in the face of popular culture. Different states, and three dilemm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u Zhiyuan, a traditionally known interviewer. This article affirms the existence of the dilemma,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dilemma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ontemporary elites. From the interview program "Thirteen Invitations" to the plight of media elit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Keywords: "Thirteen Invitations" Media Elite Elite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作者简介 (可选):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